



三联文库·文化随笔系列·

追问录

王晓明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上海三联书店

00150181

追问录

王晓明 著

上海三



I266/298-N



290607371

追问录

著 者/王晓明

责任编辑/杨晓敏

装帧设计/桑吉芳

责任制作/朱美娜

责任校对/达 微

出 版/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

发 行/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

制 版/上海申亚实业公司

印 刷/上海天华印刷厂

版 次/199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/1997年5月第3次印刷

开 本/787×960 1/32

字 数/77千字

印 张/4.25

印 数/7601—14600

ISBN7 - 5426 - 0525 - 9

G·84 定价 6.40 元

目 录

小引	(1)
在邪恶人心的包围中	(3)
过于世故的眼光	(9)
倘若甘罗绵绵不绝	(13)
可怜的韩非	(17)
孔夫子的火眼金睛	(21)
两全其美的“性善论”	(24)
但愿鲁迅说错了	(29)
君位崇拜的俘虏	(34)
被挤扁了的灵魂	(39)
“孝道”——一个诱人的比喻	(46)
可怕的“穷”字	(50)
骨子里的悲观	(56)
阿 Q 真是吹牛吗?	(61)
工兵式的紧张	(67)
《道德经》里的三个声音	(74)
不识抬举	(79)

处世之道的代名词	(86)
管家式的弹性原则	(90)
聪明人的道路	(97)
佯狂,装傻,称病和标榜腐败	(103)
在文字记载的世界之外	(109)
孙悟空和六耳猕猴	(114)
逼出来的无耻	(119)
历史的阴影	(127)

后 记	(131)
-----------	-------

小 引

我常想，要做个凡事都能追问到底的人，实在是非常难。有些事情太让人泄气，倘若一味地深掘下去，你会憋得喘不过气来，甚至要后悔活在这种无趣的人世间；有些事情又太复杂，远由近因纠缠成一团，你好容易才打开这一个结，那边又牵出一股更乱的线，你常常累得抬不起手臂，不知不觉就丧失了追究到底的勇气。譬如我从事文学研究，就有一大堆疑问堵在面前：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发展为什么那样曲折？小说家的心理障碍为什么那样深刻？倘说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自己，他们所处的时代又该负什么责任？单单一个 20 世纪便能够负这个责吗？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湮埋

在历史之中？最近几年来，我一直想解开这些疑问，却总抓不住实在的答案。虽然有时候也是存心，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：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太少，又缺乏那一份持续追问的恒心。

但我总得追问下去。为了维持平和的心境而回避真相，似乎还情有可原；害怕长途漫漫而中道放弃对真相的追究，那却不可原谅了。向世界追问它的真面目，这本是生存的最后一项价值，我又怎么敢轻易地放弃？在1989年的秋冬时节，我终于得到一个重读历史的机会，拿书本和人生两相参照，自认也读出了一点个人的心得。它们当然是粗浅和零碎的，不过是阅读中的一感一叹；但我确实又抱有希望，随着这些感叹的逐渐增多，它们会不会聚成一个新的追问的思路，至少也标出一个新的探寻的问号呢？因此，我愿意将它们抄在下面，表示我还没有放弃努力。

在邪恶人心的包围中

在春秋晚期，“士”的阶层刚刚诞生，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邪恶的时代，孔子就直截了当地说，这是一个“礼崩乐坏”、“天下无道”的时代。又何止是他呢？比他早生几十年的老子，晚生几十年的墨子，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斥责，都决不比他更温和。到了战国时期，文人对时代的诅咒还愈加激烈。你看孟子对公都子的那一长篇讲话，从“尧舜即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”，到“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”^①，简直是一概骂倒。再看荀子针对“天下不治”而写的那一首“俚诗”：“天地易伦，四时易乡。列星殒坠，旦暮晦盲。

①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

……仁人绌约，敖暴擅强，……螭龙为蝮蛭，鸱枭为凤凰，比干见刳，孔子拘匡……”^①，你会不会立刻联想到《离骚》？荀子对那个颠倒世界的忿懣，似乎比屈原还要强烈。

孔子们的感觉是准确的，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，正充满了数不清的灾难。统治者的横征暴敛，诸侯间的连年混战，光是这两样，就足以把那个时代搅得一团糟了。不过，对邪恶现象的敏感，这本是文人的特点，只要他还没有麻木到丧失知觉，奴性还来不及吞噬他整个的灵魂，他就总能够感觉出四周的黑暗，不会把遍地枯叶错看成满目春光的。无论是麻木还是奴性，先秦诸子都远不及后人那样严重，他们会大骂自己的时代，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因此，真正体现出先秦文人的精神特点的，并不是他们对邪恶时代的反感，而是他们对这个邪恶的理解。

我有个强烈的印象，似乎先秦诸子都是把时代的邪恶归结为人心的堕落。老子忿忿地说：“大道其夷，而民好径”^②，就是把世事的崩坏归罪于老百姓不肯走正道。孔子则一叠声地叹道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”^③，也是从人心当中去寻找社会冲突的原因。墨子说得更明白，天下的一切坏事，都是来自一种极端自私，不肯“兼爱”的坏

① 《荀子·赋》

② 《老子·五十三章》

③ 《论语·泰伯》

心思：“今诸侯独知爱其国，不爱人之国，是以不憚举其国，以攻人之国；今家主独知爱其家，而不爱人之家，是以不憚举其家，以篡人之家；今人只知爱其身，不爱人之身，是以不憚举其身，以贼人之身。……”^①，他把这种坏心思称作“别”，说它“果生天下之大害与”^②！为什么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那样为非作歹？因为他们贪得无厌，心肠又太狠：“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”^③；统治者在上面巧取豪夺，老百姓自然在下面跟着学样：“上重义则[民]义克利，上重利则[民]利克义”，而“义胜利者为治世，利克义者为乱世”^④，这就又和墨子一样，把世道的治乱归结为人心的好坏了。到战国时代，这种荀子式的思路还更加普遍，韩非就是依它来嘲笑孔子的“仁”：“仲尼，天下圣人也，……海内说其仁，美其义，而为服役者七十人。盖贵义者寡，能义者难也。”^⑤以天下之大，只有几十人跟你走，你这“仁”不是一句空话吗？倘若孔子再世，我也真不知道他怎样来回答韩非的这番奚落。庄子更是仰天长叹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于知天；天犹有春秋旦暮之情，人者厚貌深情……”^⑥，庄学是讲究超脱的，却还是忍

① 《墨子·兼爱中》

② 《墨子·兼爱下》

③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④ 《荀子·大略》

⑤ 《韩非子·五蠹》

⑥ 《庄子·列御寇》

不住感慨人心的叵测，其他学派的文人会如何重视人心的作用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人心似乎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孔子们不但到它当中去挖掘乱世的根源，更把它竖成为一杆衡量历史变化的标尺。孔子描述美妙的“大同”世界的时候，就是把人心淳厚当作最主要的内容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；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；……货，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，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^①他悲哀世道的今不如昔的时候，也是把鞭子对准了“不古”的人心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^②他对上古淳厚人心的热烈赞颂，是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齐声高唱的，譬如在《老子·八十章》中，《庄子》的《缮性》篇中，连赞颂的语气都和他很接近。他对人心不古的生动描述，更是被荀子和韩非一再重复，什么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”^③，人心简直成为“历史”的同义语了。

每个人都愿意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过快乐富足的日子，这是人的本性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。但是，这人的本性又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，恰如一片光

① 《礼记·礼运》

② 《论语·阳货》

③ 《韩非子·五蠹》

秃秃的田野，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它会长出怎样的植物，并不取决于它自己，而要看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，看造物主向它洒下了什么样的种子，又为它配备了什么样的气候：从经济、宗教、政治，一直到道德、军事、艺术。就拿春秋战国时代来说吧，所以会弄得礼崩乐坏，天下无道，那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，就显然是主要的罪魁。人心并不能主宰世界，在许多时候，它其实倒是个可怜的被主宰者。与孔子们大致同时的古希腊的知识分子，对这一点就看得比较清楚，虽然也感慨人的道德堕落，他们的视线，却总是落在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样实在的东西上面。可先秦文人就不同了，从孔子开始，大多数人似乎都盯住那抽象的人心，把它看作是时代的主宰者，无论什么坏事情，都要拉它来负责任：这种特别的眼光，究竟是怎么来的？倘说孔子是没有办法，他认定西周的社会制度是尽善尽美，不能改变，现实偏偏又非常糟糕，他就只有归咎于人心的恶化，那其他许多并不像他一样迷信传统制度的文人，为什么也都把人心看得那样重要呢？在他们对人心的这种过分的重视背后，是否正隐藏着某种有关中国思想史起源的秘密呢？先秦诸子是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开创者，几千年来，人们经常都只是在他们划定的大范围里精耕细作，并没有谁真能够远远地逾越出去。因此，我就格外想知道，当这些精神垦荒者眺望茫茫荒野的时候，是谁牵引着他们的视线，在不知不觉中限定了他们的开垦方向？也许，那个被他们盯住不

放,以为时刻包围住他们的险恶的人心,正是这些牵引者中的第一位,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许多独特的内容,也正可以由它得到解释?

过于世故的眼光

一个人老是盯住一样东西看，时间长了，这样东西就会反过来影响他对其他事物的观察。先秦文人格外注意人心的险恶，看得多了，再遇见别的现象，也就会不自觉地首先从这一面去理解。譬如有这样三个人，一是孔子的弟子曾参，他笃行孝道，曾经表白说：“吾尝仕为吏，禄不过钟釜，尚犹欣欣而喜者，非以为多也，乐道养亲也。亲没以后，吾尝南游于越，得尊官，……然犹北向而泣者，非为贱也，悲不见吾亲也”^①；二是卫国的大臣史鳅，他多次谏劝卫灵公，那昏君却不听，他便吩咐儿子，自己死后先不要埋，就停

① 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

在家里，向卫灵公作最后的“尸谏”；三是齐国的隐士田仲，非但自己不做官，还不肯接受做官的哥哥的接济，硬是要跑到荒僻的地方去种菜。这三个人，在战国时代都是被大家广泛称颂，誉为圣人的。可是，庄子却别具慧眼，看出他们是沽名钓誉：“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史是之。”^①荀子则说得更尖刻：“夫富贵者则类傲之，夫贫贱者则求柔之：是非圣人之情也，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晦世者也，……田仲、史鰌不如盗也。”^②连圣人都要怀疑，对那些模仿圣人的人，荀子就更不相信了：“今之所谓处士者，……以不俗为俗，离纵而跂訾者也。”^③“以不俗为俗”，这话说得太犀利了，在这样世故的眼光的眼光的逼视下，恐怕任何人都会不自在吧。

这种从人心的阴暗面去理解世事的习惯，到韩非那里是发展得更厉害了。先秦的许多典籍都提到一位著名的隐士务光，说是商汤要将天下让给他坐，他坚辞不受，为了表明心迹，干脆背着大石头跳水而死：你看，商汤王是多么无私，务光又是多么清高。可韩非却不这样看：“汤以代桀，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，因乃让天下于务光。而恐务光之受之也，乃使人说务光曰：‘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，故让天下于

① 《庄子·骈拇》

② 《荀子·不苟》

③ 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

子。’务光因乃自投于河。”^①原来商汤是这样狡诈，务光是这样懦弱，他所以要自沉，是因为认定已经死路一条！应该佩服韩非的世故，他对务光投水的解释显然更合乎情理。但我又替他感到悲哀，他总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理解人事，自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？

说到底，世故是一种病态，它起因于对人的不信任。一个人越是世故，他的精神负担就越沉重，心情也就越阴暗。我不禁想起《说林》中的另一个故事：“齐中大夫有夷射者，御饮于王，醉甚而出，倚于郎门。门者刖跪请曰：‘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？’夷射叱曰：‘去！刑余之人何事乃敢乞饮长者！’刖跪走退。及夷射去，刖跪因捐水郎门溜下，类溺者之状。明日，王出而呵之，曰：‘谁溺于是？’刖跪对曰：‘臣不见也。虽然，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。’王因诛夷射而杀之。”这是多么可怕的故事！可韩非的著作，尤其是《说林》篇中，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许多这样的故事，仿佛作者是在存心搜集它们。有人说这《说林》是韩非作为写作素材汇编起来的，倘若真是如此，那这些可怕的故事会对他的理论思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在韩非的时代，那么多文人成为功利主义的信徒，怕也与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分不开吧？从春秋到战国，世道越来越乱，士的处境也越来越糟；而你看庄子、荀子和韩非子，他们对邪恶

① 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

人心的体味就明显要比春秋时代的前辈更为深刻，那种世故的眼光也显然更为犀利和执拗，这究竟是幸，还是不幸呢？